

銅山蕭一山編

清代通史

QINGDAI
TONGSHI

孫文署

一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銅山蕭一山編

清代通史

QINGDAI
TONGSHI

孫文署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彼岸学术出版策划室(汪宇)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5-101号

銅山蕭一山編

清代通史

孫文署

蕭一山編

清代通史

蔡元培題



銅山蕭一山著

清代通史

梁啟超署



銅山蕭一山著

清代通史

張伯英題



出版说明

《清代通史》由我国著名学者萧一山所著。

萧一山(1902—1978),名桂森,号非宇,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2年赴欧洲考察。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到台湾,长期从事历史研究,有多部著作行世。

《清代通史》自20世纪20年代出版以后,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新史料发现甚多,如军机处及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太平天国遗书文物之研究,各国秘档私藏之公开展览,凡足以证往谍传说之谬误者,皆一一加以删正。原缺篇章,亦为补充,又增数十万言”,即为今日所见之书。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资料丰富,叙事明晰,使阅读此书的人,对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民生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也为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从事清史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及其治学态度、方法等原因,书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能代表我们今天的观点,更不能代表出版社的观点,这是特别需要指出的。

为保持此书的完整性,我们在出版此书时,除对书中的文字、标点及个别字句作必要的订正、删改外,未作大的改动,保持了该书的原貌。而书中有些提法,如称会党起义、少数民族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为“贼”、“匪”等,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均应加以注意。

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曾影印过《清代通史》;我们此次出版,改为简体横排,以方便读者使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

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读

王家范

打开《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洋洋大观，厚厚五册。上卷初版至今，已越八十余载，后人闻兹念兹，未曾忘却，一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年轻的或许已经不熟悉著者萧一山的生平^①。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于北大三年级的学生，年方二十二岁；而全书杀青，三卷联袂问世，竟在四十年之后，算得上是近世学术的一件奇闻轶事。

不计入关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与前此的朱明王朝一样，都曾被遗民虚称据有江山三百年。一代王朝，横跨四个世纪，名副其实是一具“超生命有机体”。一个强大王朝统制全国权力的丧失，可能起于朝夕突发事件，生死按钮瞬间拨动。但即使真的死去了，关于他的集体记忆，不仅光怪陆离、纷纷纭纭，而且还会存活很长很长时间，不同的时候，扰动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希望拥有一部没有任何争议的王朝记忆史，只能说是想象力的贫乏。赤橙黄绿青蓝紫，史家笔下的往事，原就是这样的绚丽多彩。从不同的记忆视野里，我们感受的，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面对《清代通史》，如果能知道前贤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以什么样的心境激活历史，或许会使阅读的兴味变得更浓。

^① 萧一山(1902—1978)，江苏徐州人。笔者推荐阅读萧立岩《萧一山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萧立岩，已故，为先生徐州同乡同族。全文所述事迹准确，且对《清代通史》内容有较详细的概括分析，是笔者所见怀有敬意、持论较为系统公允的大陆代表作。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几经努力,获得了《清代通史》的台北正式版权,消失于大陆书市近二十载的巨著始得重新印制,贡献于读者之前。蒙社长热忱邀请,后学不敏,岂敢以“前言”自居?秉同情了解之精神,改以导读形式,希冀与读者一起走进这座“老屋子”,流连故地,聊充导游,不亦可乎?

清王朝,愈走渐远。若论出生于“大清”的人,至今已寥若晨星,万里之内,恐怕难觅一二有如此耐力的人。既是这样,任他雨打风吹去,干卿底事?不然,不然。历史记忆,不是哪个或哪些有直接利害之士的专利品。它永远是属于公众永恒拥有。因为现世的心理感受,往往需要有历史反刍来添加情味,催生感触。稍稍关注网路,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兴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这一新科技时代的世象,有意或无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部清史永远咀嚼不完,不是那么容易“盖棺定论”的。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①萧一山《清代通史》迥异于此,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先生立论无不以丰富的史料作为根底,罗织有序,叙议相洽,读来有滋有味。另有一点更须指出,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②而这些文献,若初入清史者,极不易搜检,自己去寻觅,定要费很多精力。笔者以为,《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借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对萧一山《清代通史》有关史实、史识,究竟今日如何拾得、补阙、纠谬,作何种话题发挥,一概留给读者。此非存心偷懒,乃是有感于识史无涯,见仁见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8年。本书原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出版,参与写作者为童书业、方诗铭。

② 稍感遗憾不足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引文,未加注来源书籍。旧日“通史”习惯上极少加注史料出处,钱穆《国史大纲》就不加注。这一做法毕竟不便于读者检阅查对。

智,世无定评。让她自由地存活在公共空间里,永被人关注,岂不对先生更好?!

(一)

一九〇〇年,章太炎处在国学底蕴与政治激情内心交战的特殊时段,著名《哀清史》以及所附《中国通史略例》^①里表达的看法,也混和着复杂的心情。此时,他已经敏感到,“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但对“清室猾夏”的种族愤激,炽烈如火,而文字狱戮虐士子的恐怖记忆难以抹去,心中隐然作痛。他不无偏执地控告“乾隆毁故籍,姻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媮窳,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由此,炳麟先生断言:清之亡,将与此前的历朝易代迥相大异:“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时之,人死而有随之送以赠襚者,国死而赙送亦绝,可不哀者?”

亡国而无信史随行赙送,无异于恶骂满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谏,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斟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②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二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

① 章炳麟:《楹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该书于1899年编定,由梁启超题写书名,1900年木刻印行。1902年重订,1904年在日本铅印出版。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楹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8页注。

② 清国史馆首创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十年(1765)两次重开国史馆,历朝均有辑修。除《实录》、《会典》外,历朝开馆修编的《国史列传》,实为《清史列传》所据稿本来源之一。事详王钟翰《清史稿略说》,载《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于史料的价值,萧一山的看法比较公允:“史料之性质与价值,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倘社会上果有绝对真实之原料,则又何需乎史家为耶?”

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十一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政府。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①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则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

文网严密,史讳莫如深,清室的确超越前代,章氏之贬决非虚语。然即使统制最有效的康雍乾年间,也百密而一疏,今之《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六百三十四种书籍,仅史部即有一百五十七种之多,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收藏,足证有碍清室之史籍,迄有清一代,亦毁不尽、禁不断。而况有清一代,朝野人士的文集笔记,以及公牍档案、地方志书、官箴吏治诸书,汗牛充栋,均属不可忽略的“原料”;像魏源所作的《圣武记》,有类晚明私修明史之作,更为初创清史时必援之书。以此而论,章氏谓有清无史,偏激过之。

随满清朝政日趋衰微,岌岌可危之际,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借秽褻、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②。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一九四二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著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

① 笔者所得,此语最早见于《元史》卷156《董文炳传》。1276年元兵入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明末黄宗羲则曰:“国可灭,史不可灭”,载《南雷文案》卷6。晚清魏默深《进呈元史新编序》:“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载《魏源全集》12册《古微堂外集》卷2。至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重提旧话,云“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今虽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载《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62页。

② 指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乙酉纪事》(一作《嘉定屠城记略》),前者述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作舆论准备。

著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著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邇朋所著)、印鸾章之《清鉴》等。^① 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②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作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三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③。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有可能比

^① 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4。原书最先由贵阳文通书局1941年印行,惟一册。后经著者增订,篇目有增,分三卷,由经世学社1948年于北平印行出版。

^② 王家俭:《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载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萧一山先生文集》下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本,第735—759页。《文集》编于先生病逝后,分为著述、行述与大事记、附录三编,分装上下册。含图文共1036页,文字实934页。萧立岩:《萧一山传略》,参前注。

^③ 王钟翰:《清史稿略说》。有关《清史稿》编纂始末及其成败得失,钟翰先生叙述准确详尽,持论最为公允。收入《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今之《清史稿》最佳版本,应属台北《清史稿校注》,费时十余年,据云校订修正约计8万余条。

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①《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借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们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借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饜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②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③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我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一九〇八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库吉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

① 孟森认为《清史稿》虽属未经官方认可之书,然而取材编纂却具备历代官修史书的条件,可以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先生且说:“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参孟森《明清史讲义》商鸿逵“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

② 梁启超:《萧一山清代通史序》,载《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刊本,1923年。

③ 《清史稿》刊印第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中央政府,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此文及容庚语,转引自《清史稿略说》,详前注。

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著,所涉领域,多为我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心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①于是,想起寅恪先生一九三一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②

一九一四年四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八十四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郎《清朝衰亡论》、《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郎《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郎《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著^③。因此,稻叶专著虽出一人之手,实立

① 详参陈慈玉:《案牋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侧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第10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日本“东洋史”的发展,与日本“亚洲主义”,以及日本当局对我国东北、台湾与朝鲜的特殊关怀,均有联系。此已为日本史学史的研究者所共知。

②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参前注。

③ 笔者所据《清朝全史》为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1960年中华书局再版本,该书原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4年12月初版。初版本,上海社科院图书馆有藏。稻叶君山,又名稻叶岩吉(1876—1940),1897年在东京学习中文,1900年前往华北游学,后进入汉口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支店工作,曾游历华中一带。日俄战争时,担任军中翻译。他私淑内藤虎次郎,1907得随其赴满洲考察。后进入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参加《满洲历史地理》编纂。习中、韩及老满文,出版《清朝全史》的次年,又有《满洲发达史》应世。

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①”!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一九一九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十七岁。关于著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一九三四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②一段自叙,描述编著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一九二〇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搜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一九二一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著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一九二二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著作”。一九二三年,三年级,“本年先生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③

鉴于学界征引先生大著,所注版本时有讹误,一并综述于下:《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版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九二五年

① 见前引王家俭文。

② 文载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5,第11—12页。

③ 《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2编”,第640—642页。

十二月由中华印刷局续出中卷。^①一九二七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九月发行上卷,次年九月再出中卷。三四十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一九六二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版。前此均无下卷。至于下卷讲义,早在一九二六年前即已写就,曾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乃渐有“盗本”流传(中华印刷局借机偷印)。直至一九六三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向世,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大陆中华书局于一九八六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〇年的修订本第五版,印数不多,现已不易检阅。笔者所阅上、中卷两书之初版本,系已故郭廷以所生长生前捐赠于台北“中近所图书馆”,顺此向原藏主致敬。各时期版本,蒙车守同君于台北辛勤寻觅复印,得睹始末,殊属非易,深致谢忱。

(二)

《清代通史》出版之前的状况,约略交代已过。然,有关此书著作原委,笔者始终有一个困惑萦绕心头不去: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编纂大型清史的首项记录,实是奇迹;四十年间,早下有卷讲稿写就,何久久不欲功成名就,使全书完璧向世?不能不说有点儿怪。这一奇一怪,何以通释?

一部书能够长久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必有写作者的人生传奇值得追思,内里还藏着一个孕育写作的时空世界,故事里有故事,环环相套,悬念不少。后人欲有同情的真了解,先得通过“知人论世”一关。犹

^① 援引者多作“中华书局”,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仍不能确定北平中华印刷局是否系上海中华书局分局。此处存疑。据《清代通史》上卷初版版权页,注明著作兼发行者:铜山萧一山;印刷者:中华印刷局(北京梅竹斜街中间电话南局 1673 号),笔者揣测初为著者自费出版。初版中卷,遂改为著作者:萧一山,印刷兼发行者:中华印刷局(地址同上)。作者并有附言云:“本书上卷出版后,不及三月,销售殆尽。中卷久当付梓,止于经济困难,迟延至今,屡承读者函询,不胜歉仄之至!下卷述同光以还事,故旧遗老,犹有存者,拟笔咨访,自不免稍稍时日,本年秋季,或可出版。一俟刳蒔,当再通告。一山附启。”“本书广告”内言:卷上,内容约 60 万言,凡 800 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卷中内容 70 余万言,凡 900 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五角。